

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默克尔手机一事,不久前在美德两国闹得沸沸扬扬,美国人的监听技术一度成了热门话题。其实在冷战期间,东德在监听技术领域也曾经“非常了得”,在华约内部仅次于苏联的克格勃。

东德监听技术曾经“非常了得”

眼花缭乱的“容器”

斯塔西成立于1950年2月8日,正式名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冷战期间,东、西德分属两大阵营,斯塔西是在苏联扶植下成立起来的东德间谍机构,主要任务是对内监控、镇压反对派,对外进行各类间谍活动,尤其是针对西德展开间谍活动。斯塔西的首任部长为蔡塞尔。在他的打造下,斯塔西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仅次于苏联克格勃的第二大间谍机构。

斯塔西的标语是“我们无处不在”,其监视监听工作被“科学化”到极致,而监视监听工作“科学化”的物质基础则是斯塔西研发的一系列间谍装备。斯塔西负责研发间谍技术装备的机构名为“技术行动处”(OTS)。其主要职能,自然是进行间谍技术的开发,比如发明或改造微型间谍相机,分析其他国家的秘写墨水并研发自己的,训练印刷工伪造护照等等。

1974年,斯塔西高层对监听设备需求突然猛增。“技术行动处”下属的“E部”开始研发大量相关装备,如可以放在妇女手提包内的小型录音机。到1980年,“技术行动处”E部总共研发出643种磁带录音机,并投入“实战运用”。这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伪装成手表的录音机、藏在风衣内的照相机等。

“技术行动处”的另一大发明,就是研发可以安全通过X射线照射的装

备。在西德的入境处,安检仪器上的X射线如果照射到金属物体,就会发出警报声。一些携带着间谍用容器(主要用来安放写有情报的纸条及微型间谍装备)的间谍因此被西德抓获。为此,“技术行动处”试图用非金属材质来制作容器,比如皮革。另一种方法则是“混淆视听”,比如一种容器被设计成紧靠皮包搭扣处,使得警报器作响时,安检人员还以为是搭扣上的金属导致的。

总之,“技术行动处”的工作使得斯塔西的间谍装备看上去令人感到眼花缭乱。冷战时西德境内遍布东德间谍,在这些东德间谍的家里,房里哪怕再小的物件也可能隐藏着一台微型间谍相机。

有了这些“容器”外加米诺克斯微型相机,东德间谍的情报搜集能力着实了得。斯塔西运作40年,收集了海量监控档案。甚至苏联克格勃也常利用斯塔西的庞大网络获取第一手情报,然后直接送往莫斯科。柏林墙倒塌后,德国当局曾逮捕了一名名叫乔钦·普鲁泊的前东德间谍,在其家里搜出了至少10种“容器”和米诺克斯微型相机。事后证明,这名东德间谍在冷战时十分“高产”,每次和接头人碰面都能提供500多张照片,内容包括西德军队会议、军事计划以及军事演习,甚至一些媒体都未报道的有关北约的情况。

西德政治家没少被监听

斯塔西尤其以对东德内部人民

的监控出名。在斯塔西“技术行动处”内部,负责电子监听的部门被称作“大耳朵”。它成立于1953年,主要任务是挖出藏身在东德的西方间谍。“大耳朵”会通过电波来源确定间谍的具体方位,然后通知“间谍捕手”去抓人。

监听政治家间的对话是“大耳朵”的拿手好戏。在这方面,“大耳朵”有一套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流程。他们的监听人员会长期戴着耳机,在嘈杂的电话对话中寻找能引起他们兴趣的东西,一旦发现“有意思”的对话,监听人员就立刻通知录入秘书将对话打印出来,如果确认是重要信息,则在24小时内迅速向上级传递。在最终形成的报告中,不会提到这些信息是监听得来,而是只提它们是在“行动中搜集”的。

曾在1982年到1990年担任西德总理的科尔,是“大耳朵”重点监听的对象之一。“大耳朵”每周都会提供25—30页有关他的监听信息文件,从1982年到1989年,根据他的电话内容写下来的情报文件总共有9000页。有意思的是,“大耳朵”通过电话监听发现了科尔领导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涉嫌非法获取选举资金的丑闻,然而斯塔西并没有利用这一丑闻敲诈科尔政府。一直到1999年,东德消失将近10年后,相关资料才被德国媒体捅出,酿成德国政坛的一次风波。“大耳朵”还掌握了一些西德政客与下属发生婚外情的“八卦新闻”。

斯塔西的监听范围当然包括本

国公民。据统计,遭到斯塔西严密监控的东德人总共有600万,约占东德总人口的1/3。

社会主义阵营的监听技术出口大户

由于间谍技术实力强悍,斯塔西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一直是间谍技术输出的大户。1950年代末期,斯塔西的“技术行动处”曾向北越运送过一大批电话监听和室内监视设备。随着越战升级,双方合作更为紧密。东德向北越提供了不少尖端技术用于同“美帝国主义”作战。北越对东德的毒药分析技术、秘写技术以及培养犬类的技术非常感兴趣,而在这些方面斯塔西非常慷慨,倾囊相授。此外,东德还是向古巴输出间谍装备的大户,包括微型照相机、望远镜、潜望镜和红外线通讯设备等。

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德政权走向崩溃。斯塔西慌忙决定销毁总部和地方各局的秘密档案。但销毁档案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完成,1990年1月15日,就有成千上万的市民冲进了斯塔西总部大楼。他们看见的是堆积如山的碎纸——被销毁的文件装了足足1.6万个大麻袋。那些来不及销毁的文件,被市民完整接收。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宣布成立“前东德国档案联邦管理局”,开始对浩如烟海的斯塔西档案的复原与整理。

(据《环球时报》)

希特勒“自杀”一小时后乘私人飞机逃亡?

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死亡,传统的说法是他于1945年4月30日下午三点三十分自尽于柏林总理府隐蔽地堡。他创立的第三帝国,一个星期后也随之覆灭。但希特勒真的自尽了吗?抑或仅仅是“消失”了?

希特勒的逃亡传说

关于希特勒之死有各种版本的“真相”。比如:当年在焚尸处发现的颅骨与颌骨,被确认为希特勒的,根据是牙医雨果·布拉希克教授和牙医技师凯特·豪伊泽尔曼从修过的牙齿作出的判断;可二十七年后他们又否认了自己的说法。希特勒留在沙发上的“血迹”,检验后证实不是血,只是色泽相似的液体,烧焦尸体的大脑里也未见弹痕等等。

比这种种疑点更为惊人的传言是:一个叫凯尔瑙的警卫员说,1945年“五一”节曾见过希特勒;丹麦海滨发现一只漂流瓶中一封纳粹士兵的信,说潜艇失事沉没,元首在密封仓内无法脱身;更为言之凿凿的则是,希特勒在阿根廷,爱娃跟他在一起!

这些说法来源于2006年阿根廷作家阿倍尔·巴斯迪的纪实报告《希特勒在阿根廷》。这是他2004年出版的《巴里洛切的纳粹分子》的后续部分。

两部书都引起轰动。这里,把作者跟俄罗斯《事实与论述》周刊记者的详细对话做个简要概括——

1945年4月30日下午四点三十分,希特勒“自杀”一小时后,悄悄乘私人飞机JU-52飞往西班牙(有人见他在飞机旁等候)。尽管盟军逼近柏林,但尚未造成对飞行的威胁。4月的最后七八天里,有一架飞机每每停在温德尔登大街。4月25日,柏林总理府掩体里,开会密谋如何撤离。女飞行员汉娜·赖奇、希特勒私人飞机驾驶员甘斯·鲍尔等参加了讨论。两天后,每架可载十人的五架飞机连同JU-52,飞抵柏林(这已得到盟军情报部门证实)。二十四小时后,纳粹空军仅存的一百架Me-262喷气式战斗机奉命升空执行任务,掩护汉娜·赖奇穿越苏军防空网逃出柏林,以此作为正式护送希特勒逃命的演习(历史学家一致确认了这一事实)。翌日,希特勒就遵循汉娜·赖奇试探过的路线逃出柏林飞往西班牙;1945年夏末,又从西班牙乘潜艇去了阿根廷。

但耿法先生转述奥地利著名历史学者安娜·玛丽亚·西格蒙特在其专著《纳粹女人》中的叙述却全不同:1945年4月26日,纳粹著名女飞行员

汉娜·赖奇冒着猛烈炮火驾机护送一名德军将领飞进柏林,在总理府地下避弹室见希特勒时,曾向希特勒建议驾机突围,但遭到希特勒拒绝。汉娜于是决心为元首殉葬。4月28日晚,希特勒为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准备私自率德军向盟军无条件投降而暴跳如雷,命令汉娜·赖奇驾机送一名陆军元帅立即离开柏林,去查明希姆莱下落并将他逮捕,汉娜才得以有机会死里逃生。书中并没有提及希特勒在最后时刻离开地下室的任何行动。

可随后不是发现了希特勒的颅骨吗?那么,没有颅骨的希特勒怎么外逃呢?作家阿倍尔·巴斯迪的解释是:那块骨头不会是希特勒的。而俄罗斯至今拒绝把这块颅骨做DNA鉴定。还有,1972年在柏林挖基坑时掘出了一具人骨骼,经DNA鉴定是卡尔·鲍曼的。这又怎么解释呢?巴斯迪认为,鲍曼确实在阿根廷和巴拉圭生活过。因此,完全有可能鲍曼死后又被运回柏林埋葬。

希特勒一行乘三艘潜艇到阿根廷后,为防泄露秘密,将潜艇都沉入海底。现在发现海面上确有巨物沉入沙中。

疑点重重的证据

同样引人瞩目的:有一编号为

65—53615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文件,谈到阿根廷一对德国移民艾克霍恩夫妇家的园丁,是美国间谍。他在一份递送的报告中说,住在拉·法尔德村的这对夫妇,从1945年6月起,就开始整理自己的庄园,准备迎接希特勒的到来。可以证明希特勒逃走的文件远不止这一份。可惜到目前为止,美国、英国、俄国都没有把涉及这一问题的档案全部解密。

巴斯迪十五年间采访了上百位见证了希特勒在阿根廷的证人。可由于害怕尚活着的潜藏此间的纳粹分子,大部分证人现在才开始张口说话。

巴斯迪表示,他已正式向俄罗斯当局提出请求,允许他对希特勒的残骨进行鉴定——准备取其DNA样本,与1960年去世安葬于贝尔格弗里德霍夫公墓的希特勒姐姐的DNA样本做比较,获得最终的证据,以证明自己说的都是事实(巴斯迪谈话时尚未知晓,保存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那块被认为是希特勒的留有弹痕的颅骨,后来经美国科学家DNA检测发现,竟是一个二十到四十岁女性的骨头)。对于沉海的三艘潜艇,他也已向阿根廷有关部门要求,把它们打捞上来作仔细研究,探求真相。

(据《书屋》)